



说什么,怎么说

郭小聪 在我们前面的大师,要爱他们

如今网络语言的口语化促进了对话,活跃了气氛,但也容易失之浅白。其实,回顾历史,有两位精神巨人一生也是“述而不作”,却成为历史丰碑。他们的思想主要是通过学生的记叙而传诸后世的。一本是孔子《论语》,另一本是《苏格拉底对话录》。这种在古希腊被称为“口语著述”的散文文体,在中国古代则概念更加宽泛,主要是与韵文相区别。不过那时还不是分门别类的时代,重要的是,《论语》和《苏格拉底对话录》作为中西文化发展的精神源头不断被回溯,令我们保持应有的敬意和传承。

苏格拉底的一些思想具有精神感召力,如他的一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下子就像闪电照亮了人与兽的根本区别,让人领悟到“人之所以为人”的

含意。而当人们沉思时,苏格拉底又告诫说,人认识自身是最重要的,而最高的智慧就是明白自己“一无所知”。作为西方人本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苏格拉底一直关心社会和人的命运,如同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感叹的,他让哲学从天上来到人间。

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但不如苏格拉底那么有震撼力。两千多年来,他有那么多的香火供奉和索隐阐释,以至于他的原初的、真实的、鲜活的思想反倒模糊不清了。如今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论语》是本令人敬畏而又比较枯燥的书,但实际上,人们只要去翻一翻就会惊讶地发现,那里面有多少给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留下不灭印记的生动思想呀。如:中庸之道、仁和为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

荡,小人常戚戚。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言必信,行必果。听其言而观其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未知生,焉知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道不同,不相与谋。三思而后行。小不忍则乱大谋。欲速则不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等。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学说有种哲人思辨的美感,能对人的心灵产生净化升华作用。那么孔子的学说就如同水银泻地,朴实无华地渗透在我们民族生活的深层土壤里。庄子文思灿烂,想象辉煌,但留给知识

阶层回味的东西更多些,而孔子的教诲则无影无形却又无所不在。人们可以说自己从未读过孔子的书,但是谁敢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行为方式,没有受到过那些格言的潜在影响和制约呢?正是这种千百年来对文明也能稳定发挥作用的,至今滞留在中国人情感意识的深层。

特别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一个堪称伟大的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般中国人都认为合情合理和不言而喻的。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老吾老,幼吾幼”之类将心比心的念头就自然而然地维系了中国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国家观念。这种不靠上帝操心也能秩序井然的社会生活模式,曾叫中世纪以来深受神权压迫的欧洲知识分子大吃一惊,他们很

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一个与苏格拉底地位相似的智者,在东方古国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精神偶像?相形之下,西方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分别得自于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等不同源流。因此苏格拉底始终是作为诸神之一,如同雕像一样立在西方思想界的广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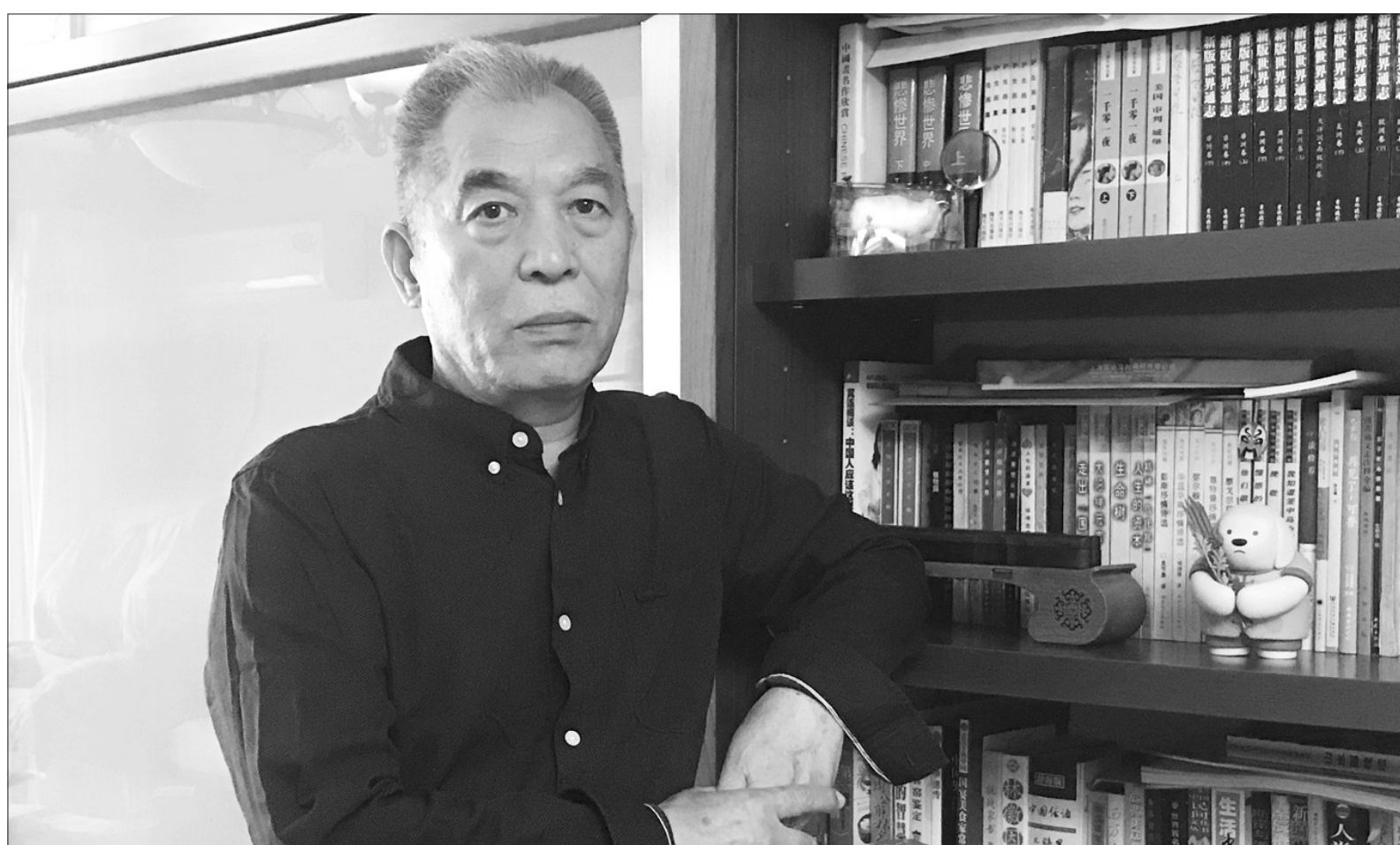
但不管怎样,“生活在你们以前的大师,你们要虔诚地爱他们。”这是法国艺术家罗丹留下的遗嘱。的确,像孔子和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曾站在人类历史的各个十字路口上,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所以,不要因为我们今天遇到什么难题就去怨他们,而应该去了解他们的初衷,懂得汲取有益的东西;而且这些“思想者”身上的精神韧性,尤其令人惊奇。

梁晓声:我比蒲松龄幸运得多

70岁的梁晓声,在2019年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知青》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到2017年出版的三卷本《人世间》。与共和国同龄的梁晓声,堪称中国文坛的常青树。多年来,他始终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关注、对世道人心的救辅,一直是他创作和一系列社会活动、参政议政的本衷与初心。他曾经对文化有过四句非常精辟、广为流传的表达:“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样的价值理念不仅体现于他的文学小说创作,更直接地体现在一系列文化随笔作品里。

他也一直在积极倡导现实主义题材。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是一部关于苦难、奋斗、担当、正直和温情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一个个可亲可感的人物,全景展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梁晓声说,《人世间》用文字为他所认识的家乡人画了一组群像。



梁晓声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成。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世界语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作品数十部,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2019年,《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现过。

中华读书报:您的文言文作品,和《聊斋志异》一脉相承,甚至更直接,更尖锐。

梁晓声:跟现实联系得也紧密。小说里的那些事都发生过。活剥狗皮、喝人奶……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谈到这些事情时已经没有感情,这证明我们的心变得多硬。我在小说里用了很恶毒的方式诅咒这种行为,我对这种行为为深恶痛绝。《聊斋志异》的批判性有一些,总体上很少,更多地是以讹传讹的记录和爱情故事,实际上构建了好女子的世界,构建了一个大观园,供和蒲松龄类似的落魄文人躲进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避。

中华读书报:您比蒲松龄勇敢得多。

梁晓声:也比他幸运得多。蒲松龄形容自己像秋蚕,依偎着栏杆取暖,很让人心疼。过去中国只有一种知识分子,如果考场失意,家庭没有保障,是很落魄的。中国当代作家生活保障上比国外作家幸运得多。

中华读书报:但是这种体制也会被一些人诟病。您怎么看待这些不同声音?

梁晓声:这是中国特色。我原来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想法,几乎要形成建言。后来我去一个县里,他们组织活动,来了二三百文学爱好者。中国的民间基数这么大,又有这种写作的民间传统,不能说这种机构本身没有作用。否则就自生自灭了。有体制保障的话也许会促进文学发展。

中华读书报:2019年,您先后出版多部著作,又获得茅奖,是不是对您而言这个年份格外特殊?

梁晓声:不获奖的话也一直是这么写过来。如果我自己对于文学形成了某种理念,就总得抓住写作的意义。如果70岁的时候还仅仅是印了多少册,得了多少稿费,文坛怎么看自己,已经不能使我感觉到抓住了真正的意义。实际上文学本身是文化的副产品,又应该是文化的长子。假如是长子的话,生活中的长子,都要替家庭承担一些责任,文化的长子看到了文化在那里发挥作用发挥得那么沉重,也要做些什么。我是把文学创作放在文化背景上,而不仅仅是文坛上。这样的意义才符合我的理念。

我在北京语言大学教书,教到最后,学生问文学的意义,怎么回答,能使人成功?太够了。无非就是提供了欣赏和娱乐,在欣赏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入文的价值。我们看,即使在英国的电影评奖,凡是那些优秀的文艺片,只要呈现出优秀性的话,奥斯卡奖都会给它。而且大部分文艺片都有它的严肃。它的文艺也在替它的文化起着这样的作用。

手机上小猫小狗太多

中华读书报: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您还不用手机。现在手机阅读已经很普遍了。

梁晓声:我现在的手机,也只是用于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自媒体、网络对我没有影响。我不认为我要知道那么多的事情。而我想要知道的事情,通过视频渠道,通过和朋友们交谈,基本能获得足够的了解,而且超过网络信息的可信度,所以我觉得并没有落后于时代。但是我不排斥网络和手机,它们对人类生活提供的便利是无可争议的。存在即合理。不是合乎价值观,而是合乎一件事情发展的逻辑。

中华读书报:您不用微信?您认为手机阅读和纸质阅读有何区别?

梁晓声:没有微信。我也不是需要很多娱乐。手机阅读有几点绝对不是书籍能够相比的,一个是手机内容的趣味性、娱乐性,手机可以在一分钟甚至半分钟内n多次地转换网络平台。有一天我试着看了一下,发现我喜欢听郎朗、卓玛的歌,稍微点一下,就可以听半个小时到一小时。耸人听闻的事情也很多。总之,当你拿手机哪怕很认真地看一篇文章时,头脑中好像还是有另一个声音说“快看快看,还没看完吧,另一个屏更好看”,任何一本书肯定败下阵来。

另外还有手机本身的参与性,我有话要说,点一下就能发言,或者挺人,或者骂人,平时骂人还侵犯人权甚至打起来呢。在手机上骂狗你你可知我是谁。读书时不会有这种状态,读书时在留白处记录下的心得那真是心得。

还有手机的工具性,几乎像背着字典一样方便,你说牙疼,点开就告诉你怎样让牙不疼,但是有一个功能手机不能比,就是当你拿起一本书来读时的那种专一和沉浸。哪怕只看半个小时,这个时脑子里没有声音说“快看快看书架上还有别的书”,没有。沉浸本身对人的身心也是有好处的。读一本好书时,你处在一种有缘、感恩和谦卑的状态。这真像一个好朋友跟你娓娓谈心。因此,书,

尤其好书,真的是良师益友,你在书中能体会到语言本身的魅力。网络中也有很好的语言,很棒、很精准,很牛,但基本是语录式的,是短句,如果请他写三千字的好文章,写三万字二十万字每一页都能读下去的作品,可能就不行了。但是写书的人能够使文字征服人。阅读习惯的作用也就最大程度地体现出来了。

为大三线工人画像

中华读书报:您的现实主义题材写作一以贯之。在书写现实主义题材时,您觉得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梁晓声:我一直对现实主义非常尊敬,主要由于我在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的时候所看的长篇小说大部分是现实题材。下乡前我看了相当多的外国文学,很多都有现实主义的品。到了80年代,我们这一批作家初上文坛,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的过程,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题材为主,老中青都在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但是2000年以后发生的变化是,文学中的现实题材少了,尤其是年代感的现实题材少了。我写《人世间》,也有向现实主义致敬、向新时期文学致敬的夙愿。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现实题材少的原因是什么?

梁晓声:大家都有一些困难而退。我的性格是愿意知难而上。除了向现实主义、向新时期文学十年致敬,还有一个情愫:我对当年的大三线建筑工人怀有敬意,希望用作品为他们画一幅肖像。

我父亲是大三线建筑工人,他几乎走遍了大西北的各个地方。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子女的家庭可以有一位子女留城。因为学历低,留城子女从事的多是城市低端的体力劳动,而且心灵孤寂。底层人家的父母辈,多是沉默寡言,而且很严厉,小儿女们不会跟父辈交流,如果没有书信,也没法和哥哥姐姐们交流。这种孤寂中成长的小儿女从来没有被人关心过,文学品画廊里这样的人不多,我愿意为他们画一组素描。

一路写下来,会遇到自己纠结的方面,总觉得这样写行吗?但是我还是认为应该按照心中所想,尽

量呈现出来。

中华读书报:什么样的纠结?

梁晓声:从起笔的时候就纠结。小说从1972年写起。这在很多人看来不明智。但是写这部书的时候,我除了心中的一些杂念,这比技巧更重要。写三卷本,这么长的篇幅,可能市场也不接受,我也要排除市场的因素。我不想通过写作证明自己的才华,也不想满足市场了不起的期许。甚至对于评奖,也保持了敬而远之。只想完成我认为的现实主义在今天能达到的最大尺度。

中华读书报:《人世间》写完之后您满意吗?

梁晓声:一直到现在还是很累,身体有些恢复不过来。我现在还戴着颈托。上部是用行楷写,还比较工整,到了中下部的时,字体就变写了,写全部作品后,我已经拿不动钢笔在方格纸上写稿子了,开始用上了铅笔和A4纸。《人世间》下部还没写完时,我感觉非常不好,就在北医三院化验科做化验。做过就忘了,北医三院电话通知我到医院时,我还以为是骗子。医生说情况很不好,又让我做了第二次胃镜,建议三个月我转到肿瘤医院,那时就商量动手木的事,要全部切除。医生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家族史的(我父亲就是晚期胃癌),选择胃癌前期全部切除,防止扩散;也有另一种可能,是五年十年没有发展。我的书还没写完,胃如果切除,一切都要停下。离开肿瘤医院的路我吸了两支烟。我相信自己的抵抗力,还是选择了保守治疗。我宁可相信后一种。

创作童话,解读《聊斋》

中华读书报:您今年出版的《梁晓声童话》(山东教育出版社)包括五册图书,为什么想起来写童话?您小时候的童话是哪些?

梁晓声:刚写完长篇会比较疲劳,借机调整一下。写童话一直是我的愿望。我常读读书大使,推荐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书,发现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写实的很少,低龄读物、父母可以读给孩子听的少。更多的是读国外

的,比如《窗边的小豆豆》那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想不如自己动手写。

我小时候没接触过童话,直接越过了童话接触民间故事。各个国家的童话不一样。有的童话专讲故事,对儿童没有寓教于乐的功能,《格林童话》就是这样。安徒生童话主张教育,儿童时期是给人人生底色色的时候。我主张把善良和爱放在第一位,善良、友爱、助人为乐。

中华读书报: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您还有进一步的规划吗?

梁晓声:2020年初还会出版五本,就是了却作为作家的一桩心愿。中华读书报:《狐鬼启示录:梁晓声说《聊斋》》是一部从微观视角切入、品评中国文化特点极富意趣而又有人文关怀和思考深度的作品。您和《聊斋志异》有哪些缘分?您喜欢哪些故事?

梁晓声:最初是听母亲讲过《聊斋》里的故事,但是也就讲过一个,更多是讲包公。小学二三年级就接触《聊斋》,很多故事改编成了连环画、小人书。我下乡前从邻家叔叔处,加白纸张书皮,写“个人批判资料”六字,下乡时悄悄带着,聊以解闷。我在1982年初就买过《聊斋志异》,字很小,每本才八毛多,买来一直在我的书架上。

中华读书报:您对《聊斋志异》有怎样的评价?

梁晓声:我不喜欢,现在评价也不高的是《画皮》。无非就是告诫男青年万不可被女性的外表美所迷惑,那是很危险的。我当年喜欢的是《婴宁》《青凤》《聂小倩》等,因为这类故事中的仁与义、恩与报恩是其它故事少有的,不仅使男女之间的爱情显得极为特殊,即使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论,对我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好人”文学观形成,少年时受蒲松龄的“好鬼”小说影响甚深,青年时受雨果作品继续熏陶。《王六郎》一篇,是我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写男人之间缔结友谊的最初范文。《田七郎》对现代人亦有警示意义。

中华读书报:重读《聊斋》,您有怎样的体会?

梁晓声:以前这些故事都零零散散地看过,写《狐鬼启示录》之前我想重读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体会——确实感觉到文言文精准的魅力。我发现原来有些故事自己根本没读过,于时决定从头至尾细读。我总觉得欠我当年买的这套书一份读后感。没想到一写起来就写得更多了一点。

中华读书报:90年代前后,您曾写过几篇半文半白的短篇小说,对《聊斋》的喜欢非比寻常。

梁晓声:我自诩为“新编聊斋志异”,并收入自己的小说集,足可见我对《聊斋》的喜欢非比寻常。

读书这件事,我是主张读闲书的,因为读闲书也是放松,里面有些知识点、趣味性,另外也有一些读书人的见解和思想。我写的这部书,是典型的闲书,是我对自己一个心血的完成。当然,要读原著的话,如果你读三页不翻字典,那说明你的文言文水平高得多。我今天重读的时候,手边没有字典也不行。蒲松龄为了显示他的文学功力,用了很多生僻字,在一般字典都查不出来,比如关于“鞋”就有好几种写法——有些是没有必要的。《聊斋志异》是男人写的书,但主人公多是女性,因此分析两性之间,男人看女人的审美状态,以及文学故事、人物分析,是有的可谈的,甚至比《红楼梦》还要更可谈一些。

文学是文化的长子

中华读书报:您可能是当代能用文言文写作的屈指可数的作家吧?跟白话文写作相比,有何不同的感受?

梁晓声:无非是语言思维的转换,用词用字更加洗炼一些。我写得还不够文言。比如“犬卧于途,奔马过而踏避之”,这句文言文可以精炼为“奔马避犬于途”,也能明白。王勃写《滕王阁序》,自己也很得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失足落水,死后灵魂不时出现在江上,反复吟诵,后来有个渔翁听到了,说这句诗还可以精炼,“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王勃听了很羞愧,再也没在江上出